

亲密有间：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型塑

于志强

摘要：在个体化崛起的中国社会，“空巢青年”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近年来，个体化崛起致使“空巢青年”基于自我视角出发，呈现了一种亲密有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既实现了基于个人诉求满足的生活设计，又维护了个人与家庭和社群的关系互动。但是亲密有间作为“空巢青年”在微观层面的生活策略，不仅展现了社会力量形塑下“空巢青年”对当下生活的自我探索与妥协，同时也暗含着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这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崛起，同时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个体化崛起的本土特征，为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带来新的可能。

关键词：“空巢青年”；情感；亲密有间；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3—0160—09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青年代群纷纷将大城市作为个体择业的优先选择，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广阔的就业市场也为青年代群在城市谋求栖身之地提供了可能。学术界将这些独居、单身且“漂泊他乡”的青年称为“空巢青年”。在个体化趋势逐渐明显的当代中国社会，一方面，“空巢青年”作为个体选择，面临不同生活处境的青年会赋予“空巢生活”不同的情境意义，致使转型期中国“空巢青年”的生存样态呈现多样化实践。另一方面，“空巢青年”作为社会现象，又具有普遍性特征。形式上的“空巢”暗含实质上的“离巢”，青年代群离开父母，独自在异乡生活，代际主体的分离和城市陌生人关系致使许多青年面临着难以诉说的情感体验，不断寻找情感宣泄的途径。“空巢生活”为身处大城市的青年提供了情感安置的生活空间。同时“空巢青年”尚处于生命历程的韶华之年，十分重视自我的情感诉求与表达，无论当下是否进入婚恋，他们都无法规避对爱情、亲情、友情关系的情感期待、表达和反思。

鉴于此，本文以“空巢青年”的情感调适为切入口，从建构、动态、可塑的维度呈现当代“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逻辑，并以此透视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崛起的复杂路径与特殊机制，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另类实践图景。具体来说，本文拟回答以下问题：一是考察当代“空巢青年”情感诉求的实践特征。二是探究这种情感诉求在“空巢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实践逻辑与社会型塑机制，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崛起带来的启发。本文试图对转型期中国青年代群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念引领、社会心态调适及社会关系整合进行思考，同时也尝试拓宽全球一体化视野下个体化崛起的中国经验。为了实现研究目的，

基金项目：本文是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国城市‘空巢青年’成因、趋势与政策研究”（项目号：21YB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志强，男，社会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家庭与性别研究、青年研究。

笔者前期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访谈招募信息,进行深度访谈。随后通过线下中间人介绍等方式,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寻找不同职业特征、年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等维度的典型个案,填补材料缺口,实现样本饱和,发现隐藏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运行机制。在调查期间一共接触了二十余位研究对象,所有受访者均为1985—2000年之间出生,离开父母,单身且独自一人在一线大城市定居生活,多数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月收入从4000—20000元。采用线上视频网络与线下见面相结合的方式,每次访谈时间为90—150分钟。线上访谈通过平日的微信互动或朋友圈等方式来理解其生活状态,并且通过三角检验法来保障材料的真实性。在线下访谈过程中融入受访者的实际生活,通过聚餐、娱乐等社交活动了解其生活状态。

一、文献回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 相关文献回顾

不同于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的标准模式,“空巢青年”作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彰显了中国青年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上的多元选择。学术界以往主要在“空巢青年”的概念辨析、形成原因和影响后果、生存状态和政策干预等方面展开探究。具体来说,一些研究从社会变迁视角出发,认为“空巢青年”不仅是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由频繁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观念、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生子女政策交互影响形成的。^①还有一些研究从个体自我视角出发,认为“空巢生活”是部分青年经过权衡之后所做出的自主选择。个体化趋势、自我意识觉醒、自我需求满足是“空巢青年”产生的重要原因。^②另有一些研究以人类学的民族志为研究方法,深描“空巢青年”的日常生活起居,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形成了中国“空巢青年”的新画像与新特征。^③

具体到“空巢青年”的情感面向,此前已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如有研究认为“空巢青年”缺少倾诉对象和情感支持,具有心理压力、孤独感较强、缺少安全感、失落感较强^④、集体心理焦虑,弱势心态泛化^⑤、精神抑郁程度高、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低^⑥等情感特征。但这一研究结论和个体化时代青年渴望情感表达、价值实现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那么,为何以个体化为特征的青年在“空巢生活”中会出现上述负面情感?一些研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发现“空巢青年”存在主动与被动型、积极成长型、享乐逃避型、适应不良型等生活形态。^⑦还有研究认为“空巢青年”动摇了长久以来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所承载的生育或生活之道^⑧,也有研究指出“空巢”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过程^⑨,与普通青年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⑩。“空巢青年”可以通过亲属、业缘、趣缘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差序网络,发挥着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弥合作用^⑪。

既有研究表明,社会变迁、个体行为与心理等是理解“空巢青年”现象的重要视角。但尚有三点值得深入探讨。第一,既有研究均认为个体化崛起是“空巢青年”的重要面向,也有部分研究涉及情感面向,但却没有将情感视为一种分析视角,忽视了个体化崛起之后情感调适何以成为可能的讨论。第二,现有研究对“空巢青年”展开了静态的类型学划分,凸显了“空巢青年”的多元实践,但没有从主体能动性

① 周详:《“空巢青年”新画像及新特征》,《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期。

② 白淑英:《“空巢青年”:个体化逻辑的自我主义表达》,《学术交流》2021年第4期。

③ 高智博:《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空巢青年”的生活民族志》,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8—42页。

④ 保虎:《从“巢空”到“心实”:新时代我国“空巢青年”问题再探讨》,《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

⑤ 豆小红:《“空巢青年”社会心理问题与应对》,《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⑥ 郑晓冬、周如茵、方向明:《“空巢青年”的健康状况与生活状态研究》,《南方人口》2018年第4期。

⑦ 周详:《“空巢青年”新画像及新特征》。

⑧ 贺武华、雷姝:《“空巢青年”的特征、成因及其“空心化”引导》,《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⑨ 宋健:《中国家庭新形态“离巢”青年与“空巢”父母》,《人民论坛》2019年第28期。

⑩ 聂伟、风笑天:《空巢又空心?——“空巢青年”的生存状态分析与对策》,《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8期。

⑪ 白淑英:《“空巢青年”:个体化逻辑的自我主义表达》。

的视角出发,分析“空巢青年”生存样态的弹性流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第三,现有研究主要以数据调查和生活素描为主,缺乏进一步提炼“空巢青年”作为一种生存形态何以在中国社会出现的本土解释概念。基于此,对“空巢青年”的情感调适展开研究,不仅可以呈现“空巢青年”生存样态的弹性流变机制,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把握个体化时代单身独居青年亲密关系实践的普遍特征。

(二) 情感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现代化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个体日益从阶级、宗教、社区等传统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经历对传统道德稳定性的祛魅,又重新嵌入到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背景中,个体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日益得到显示和表达。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深入,个体逐渐从“为他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家庭也从“需求的共同体”变成了“一种选择性的亲密关系”。但是个体的权力与地位崛起并不意味着个体从制度结构中解脱出来,相反是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创造属于个体独有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多元且流变的生存样态特征。^①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普惠型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个体从信奉子嗣延绵的家庭主义转变为追求自我价值的个体主义,并积极追求一种去物质化、重视横向情感、平等交流的“纯粹关系”。^②由此发现,生活实践的多元流变与个体主义的情感表达成为相互建构的个体化崛起特征。

回到中国社会,20世纪早期,许多海外汉学家曾指出,家庭是理解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同时也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以同居共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情感表达和交流是缺失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③这类研究显然是以西方个体主义浪漫之爱的情感作为衡量标准,忽视了中国本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因此,研究者既要看到中国人情感生活的本土意义,也要看到伴随现代化的变迁,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逐渐消解,以学缘、业缘、趣缘等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日益凸显,中国人的情感状态在现代性变迁中发生着难以预料的种种变革。而且伴随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崛起,新一代中国人更加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体情感欲望的满足。“此时的情感”与个体意识中的内心感受、意向具有协调一致性,是一种较为复杂而又稳定的认知评价和体验。社会迁移的自由与社会文化的包容也让青年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上有多重选择,不再追求单一且固定的生活模式。但是一些研究指出,尽管中国社会呈现个体化崛起的趋势,但是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没有达到西方第二现代性下的亲密关系变革水平。^④一方面,家庭幸福依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属,甚至形成“类宗教”意义的情感寄托。^⑤另一方面,和西方社会纯粹的横向情感互动不同,个体化崛起之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夹杂着代际互动、经济往来、权力关系、家庭伦理等复杂实践形态。^⑥

根据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亲密有间的分析概念,来理解转型期中国“空巢青年”的生存样态及情感调适(见下页图1)。一方面,个体化崛起之后的青年基于个体诉求自主创造和设计了“空巢生活”,形成了“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的亲密有间形态,不仅满足了个体对私人空间自由生活和自我表达的现实追求,同时在家庭关系和社群交往中形成了情感归属和关系互动。另一方面,“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生活设计暗含着社会力量形塑。亲密有间作为个体在微观层面的生活应对策略,让单身、独居且“漂泊异乡”的青年有效地应对职场压力、人际疏离、道德滑坡、理性算计等结构约束,呈现了情感的无奈和迷失。因此,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崛起的路径,个体化在中国社会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112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与爱欲》,陈永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3—84页。

③ [日]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④ 刘汶蓉:《婚前性行为和同居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代性解释框架的经验验证》,《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李永萍:《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

⑥ 钟晓慧、何式凝:《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的崛起更相当于是在社会力量形塑下现代个体自我探索和妥协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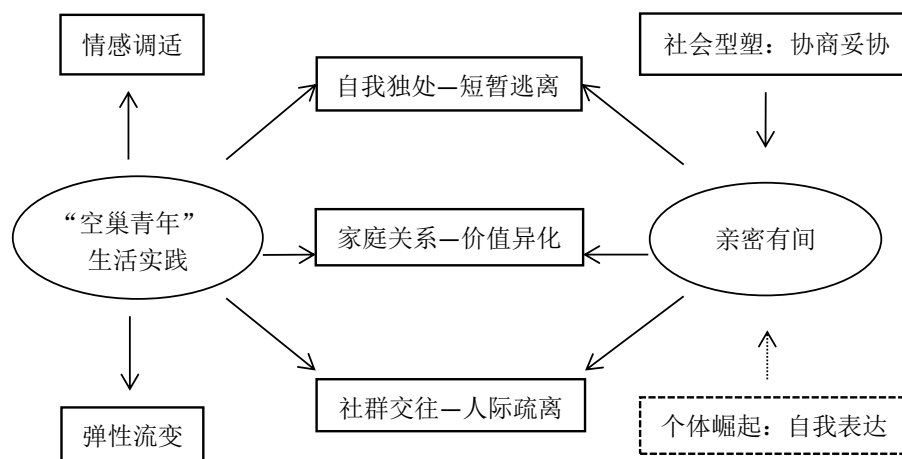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图（笔者自制）

二、“空巢青年”亲密无间的生活设计和情感调适

中国社会个体化崛起，致使“空巢青年”开始在自己独处世界里追求自我认同。但是个体化崛起之后的“空巢青年”没有陷入个体与社会断裂的原子主义，他们从自我设计的视角出发，不断建构着个体与家庭关系和社群交往的链接。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呈现一种亲密无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既创造了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同时又实现了基于个人诉求满足的生活设计。

（一）自我世界中的情感体验：自由、担忧和独处生活

个体化崛起之后，青年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情感表达，同时也期望获得个体私人生活空间的自主设计权。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空巢青年”希望可以拥有属于个人的独立空间，同时在这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中实现个体对日常生活的主宰，从而享受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一种不需要考虑他人感受、不需要照顾他人行为的独处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尽情享受纯粹的情感体验。与此同时，隐私权也成为个体化时代青年私人生活追求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成年之后，许多青年希望通过拥有独立的居住生活空间来获得和保障个人的隐私权。

我是一个对自己的空间看得非常重的人，独居会让我觉得自己有了一方天地，别人是不太容易轻易进入的，我不希望他们打乱我原有的一个生活节奏，独居会让我更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女，24，硕士，自媒体运营）。

正是因为个体化崛起之后，青年普遍追求自我诉求的主体满足，许多青年在与朋友、恋爱伴侣的合居生活中，常常因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缺少隐私等发生矛盾。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矛盾却给青年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甚至走向情感抑郁，这也成为转型期“空巢青年”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背景下，不被打扰的“空巢生活”形成了一个属于自我意义上的空间和精神独处，让部分青年实现了心理意义上的安全感，也体现了个体化时代青年对生活的自我设计。

事实上，现代社会个体化崛起具有一体两面性，个体化崛起赋予青年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自主设计权，同时青年也要承担自我选择和设计的所有后果。标榜自我世界的“空巢青年”不仅会因为长期独居而产生孤独的情绪，多数还会因为独居面临着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突发意外等无法预知的风险，以及风险后果的不可控性，这致使“空巢青年”形成一种以担忧为表现形式的情感焦虑。尽管尚处于生命早期的“空巢青年”有更多的能力来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伴随个体生命周期的转变，不少“空巢青年”会越发关注到个人晚年保障的缺失或不不确定性，这也让不少青年在选择“空巢生活”的决策上形成了对个人晚年保障的情绪担忧、无奈和焦虑。总之，面对当下与未来、自由与归属之间的两难抉择，多数“空巢青年”选择享受当下自由的时候，却带有一种生活不确定的隐患。

(二) 家庭关系中的情感互动：接纳、焦灼和弹性互动

现代化和人口迁移对家庭居住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房地产租赁市场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一家人乃至几代人蜗居的结构性紧张，让许多“空巢青年”可以非常便利快捷地租赁住房，这也为青年脱离原生家庭，走向“离巢”提供了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个体化崛起致使代际之间开始追求个人的生活空间和情感表达，这也加剧了代际合住关系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日常矛盾和情感纠葛。而这种生活和情感上的焦灼也成为“空巢青年”选择“离巢”的直接导火索。许多青年试图通过“空巢生活”来缓解代际间的情感张力，从而实现成人世界里情感的自主表达。

空间层面的“离巢”并不代表关系互动的终结。在中国语境下，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往往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尽管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无限捆绑在一起，但是许多中国父母依然对子女的“离巢”独居表示接纳与认可，并认为这是子女生活独立的表现。同时，由于成年早期的子女缺乏独自生活的经济成本和生活技能，尤其是刚刚毕业走出高等院校的青年，他们脱离了学校集体的制度兜底和生活保障，独自一人来到大城市，很难凭借一己之力顺利实现安家定居，往往会得到父母的支持，形成一种情感理解、经济支持的代际互动模式。

我爸妈也挺理解，觉得孩子大了有自己想法了。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吧，因为我毕竟刚工作也没钱。房子是我自己找的，我爸当时非常害怕我被骗，他担心我被拐卖，陪我去房东那边签了一下合同。

(女，23，本科，幼师)

在中国社会，生命周期转变往往赋予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年面临不同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任务。大龄适婚的符号意义不仅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尴尬处境，也会受到家庭主义文化的谴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父母的态度也会从最初对成年早期子女“离巢”的情感认可，转变为对大龄“空巢青年”的情感焦虑和不满。为了实现婚姻缔结的代际传承和迎合社会文化要求，许多父母不仅会通过询问和语言催促等方式迫使子女走向婚姻，也会通过安排相亲等方式干预子女的私人生活，而这正是引发代际间情感冲突，甚至是争吵、冷战的症结所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父母在子女生活、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无私付出，许多青年选择“空巢生活”的背后暗含着对父母道德上的不安和情感上的亏欠。在这个过程中，“离巢”之后的“空巢青年”在代际互动上形成了“一碗汤”的亲密有间，青年基于自我设计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交往方式。一方面，“离巢”独居让代际之间有了各自的独处空间，可以享受属于个人的情感调适。另一方面，代际之间的弹性交往，实现了个人自由和代际扶持的协调发展。因此，亲密有间的情感调适实现了个体化崛起之后代际主体间的情感互动和平衡。即使代际间隔距离较远，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让许多“空巢青年”通过微信等方式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和互动，体验代际间的情感思念、牵挂和慰藉。

(三) 社群交往中的情感链接：现实、虚拟和社会交往

个体化崛起之后的青年也会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在“空巢青年”的生活中，他们会在社群网络交往中形成一种亲密有间的特定关系链接，不仅可以实现“空巢青年”社会关系拓展，适应陌生的城市契约关系，同时也满足了“空巢青年”对情感归属、群体认同和社会互动的情感需要。此前曾有研究指出，“空巢青年”将“合租单住”的居住方式视为个人寻求精神自由的一种选择。^①但是笔者却发现，随着商品房市场兴起，城市住房租赁市场为了迎合青年对自由和交往的现实需要，打造了一种合而分居的居住空间。分居让“空巢青年”拥有属于个人的空间，合住又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和朋辈群体的归属，同时也减少了异乡青年在大城市生活定居的经济负担。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在“合租单住”的居住格局中形成了亲密有间的关系互动和情感调适，既满足了个体自由的情感追求，同时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实现个人的情感归属和社会交往，解决了独居的精神孤独和生活风险的情感焦虑。为了能够协调个人自由与社群归属之间的关系，许多青年会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合租室友，从而为“空巢青年”在合租中高质量的情感互动打下扎实的基础，彰显了青年对“空巢生活”的自主设计。

^① 白淑英：《“空巢青年”：个体化逻辑的自我主义表达》。

长期独居蛮幸福的，但是我理想的独居不是说一个人关在家里，希望有一个左邻右舍比较熟识的环境，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网。我现在在上海租loft小公寓，有两个卧室，一人一间。大家比较谈得来，可以一起玩，又有自己的空间。（女，24，本科，人力资源师）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青年利用自身掌握网络技术的优势，会在网络社群中实现社会关系的链接。一方面，以“空巢青年”为主体的网络社群早已成为其精神家园。在这个网络社群的互动中，一些“空巢青年”会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独居的生活日常，形成具有“空巢”经历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网络社区还发挥着“抱团取暖”的情感归属作用。一些“空巢青年”会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分享给社群成员，其他成员也会给予相应的解答和帮助。这种相互交流和互动也缓解了独居带给青年的精神孤独感和无助感。由于具有相同的生活经历，青年有更多的可能相处在一起，形成亲密有间的情感互动，这也推动着情感链接从虚拟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在网络社群中的许多小组成员，会定期组织周末爬山、逛街、聚餐、看电影、剧本杀，甚至还会开展更为专业且有趣的破冰活动。这些不仅让“空巢青年”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同时也实现了“空巢青年”对自我世界的情感归属和社会化链接，形成了一种自由和归属兼具的亲密有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空巢青年”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宽了社会交往范围。还有一些人通过彼此的相互接触激发了恋爱的情感关系，并且试图将这种情感持久化、稳定化、承诺化，实现从“空巢”走向婚姻关系。由此说来，居住空间的独居并不代表“空巢青年”的情感关系断裂，而是在“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的亲密有间中寻找到情感链接和情感认同。

三、“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个体选择和社会塑造

尽管“空巢青年”从个体诉求和自我设计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亲密有间的生存样态和情感表达，实现了个体化时代青年对自我欲望的主体满足。但是亲密有间作为“空巢青年”在微观层面的生活策略，不仅暗含着社会力量形塑下青年私人生活的自我探索与妥协，同时也暗含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

（一）自主设计与家庭主义的短暂逃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让个体的身份、生活方式及社会义务不再是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而成为一种可以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生活的主体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逐渐从家庭、亲属、地方社区抽离出来，打破了中国人对传统社会祖荫的崇拜与服从，中国人自主意识日渐觉醒。改革开放期间，尤其是单位制解体以后，国家日益降低了对私人生活的监管，让新一代的青年人获得了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规划权。在这个背景下，许多青年自主地选择进入“空巢生活”，追求“我的生活我做主”的理念，形成了在自我独处世界里的个体主义情感表达逻辑。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谈道，现代社会对个体自由、独立的精神推崇已远远超出了日常想象。^①而单身独居的“空巢”也成为青年经济与精神独立的情感象征，形成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情感认同和生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家不再是一个同居共财的经济实体，也不是一个道德意义的伦理单位，而是完全回归到个体的私人情感空间，形成了自我主义逻辑的亲密有间。“空巢青年”会根据自身的生活处境和个人诉求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和规划家庭关系和社群网络的关系互动与人际距离，从而实现个体化崛起的情感调适。

尽管部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青年凭借自身的阶层优势，试图将“空巢生活”的自我表达逻辑进行到底，不再将婚恋视为人生必需品，从而更好地享受独处生活。但是伴随生命周期转变，绝大多数的适婚青年都将面临着婚姻缔结的需要和任务。一方面，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关系存在，许多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伦理责任既包括抚育子女成人，也包括帮助子女成家立业，形成了父母干预子女

^① [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私人生活的中国文化特征。^①另一方面,东亚民族国家崛起,家庭的社会保障意义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单位,更加承担着为中国人抵御生活风险的重要功能。因此,门当户对的物质性匹配成为青年婚姻缔结的关键要素,此时的婚姻家庭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生活空间,而成为一个风险共担体。已婚夫妻不仅要承担着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的责任,也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家庭资源的积累与规划中。同时,个体化崛起的诉求表达也致使家庭成员常常发生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职业女性也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矛盾。在这个背景下,个体化崛起之后的许多青年在生命成长的特定阶段,会主动选择“空巢生活”,其背后暗含着对婚姻家庭沉重负担的一种理性逃离。而现代化变迁也给“空巢青年”的这种理性逃离予制度支持,一方面,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现代化浪潮,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可以依靠灵活多变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来获取个人的生存成本,极大削弱了父辈对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招、择偶匹配时间递增和社会文化的包容,致使中国人口初婚缔结的年龄大大推迟,增加了父母对成年早期子女“空巢生活”的包容性。让成年早期或者说尚未到适婚年龄的“空巢青年”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在自我独处的世界里实现自我主义的情感表达。

(二) 幸福追求与亲密关系的价值异化

传统社会一直将“光耀门楣、子嗣传承”视为中国人安家立命的本体性意义。伴随现代化变迁,中国家庭日益走向世俗化、民主化和小型化,新一代中国人对维系传统秩序稳定的家庭伦理有了更多自反精神。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空巢青年”开始追求以我为中心的情感表达。但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观念并没有转向以个人为本位的家庭价值观。^②个体化崛起之后大部分青年依然渴望实现家庭幸福,并且希望通过婚恋缔结来结束“空巢”。但同时,长期的“空巢”经历,让这部分人更加渴望生活的高度自主权。因此,他们更希望将自我主义的逻辑带入婚恋关系之中,实现个人自由和关系稳定兼顾的家庭幸福。

当“空巢青年”追求家庭幸福时,却发生了价值异化。一方面,由于婚姻缔结的物质性因素日益凸显,拥有城市住房、轿车、彩礼成为青年谈婚论嫁的基础条件。一些教育背景处于劣势、收入水平不高、家庭经济条件不佳的青年,常常因无法满足婚姻缔结的物质性要求,只能无奈地成为“空巢青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青年会在亲密有间的“空巢生活”中减少与他人的联系,形成一种克己的欲望限制,实现个人的经济积累,同时也形成了情感的被动与无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逐渐进入个体私人生活,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日益理性和工具化,收益与付出被不断进行精细化考量。许多“空巢青年”在建构“不求完美只求适合自身”的话语的同时,却遮拦不住自身对亲密关系猜疑、提防和算计的精神焦虑。此时“空巢青年”在形式上对家庭幸福充满了情感期待,但实质上却呈现情感彷徨、算计和纠结。因此,在亲密关系价值异化的背景下,“空巢青年”自主选择了亲密有间的情感调适,并且在弹性的关系交往中实现关系链接和个人私人空间的满足,找到个体相对舒适的生活方式。

(三) 职场求存与市场经济的人际疏离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个体从传统的道德规范中解放之后,又嵌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崛起呈现一种“奋斗个体”的拼搏精神。加之,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中国高等院校改革转变了以往统一分配的就业模式,为许多在异乡打拼青年的职场发展奠定了条件,也为“空巢青年”“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价值理念奠定了经济基础。但不少“空巢青年”却呈现出对职场的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的不适应。一方面,竞争激烈的职场让不少青年的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当忙碌的工作占去了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青年代群在恋爱、交友、娱乐等方面的时间就被大大挤压。因此,

^① 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

^② 徐安琪:《家庭价值观的变迁特征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

许多“空巢青年”回到家里之后，更希望可以自我的角度出发享受属于个人的私人空间，缓解职场竞争的情绪焦虑和紧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和人际冷漠，让许多“空巢青年”白天工作时面临着人际疏离和低信任的职场关系。同时，个体在职场中社会地位的无意识比较，也产生了人际位差的情绪失落^①。因此，当“空巢青年”离开职场环境之后，他们本能地希望“不再迎合他人”“不再伪装自己”，可以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回归到那个真实且自在的情感世界里。

由此可见，“空巢青年”在职场中不希望职场同事介入到个体私人生活，保持一定的人际关系距离，维护职场环境的契约化工作方式。同时，不掺杂更多私人感情的职场关系也让个体免受职场的私人道德非议，为个体的职场生存增添了一重保障。而“空巢青年”在网络社群中的社会交往关系，不仅使“空巢青年”找到与自己个人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相符的朋辈群体进行娱乐社交。同时社会交往的时间、地点、内容和频率不再如同职场的标准化程序，而是呈现灵活多变的弹性交往。总之，在市场经济人际疏离的背景下，“空巢青年”将亲密无间视为职场的求存策略，通过与激烈职场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保持明显的边界，让“空巢生活”如同一个安全的堡垒，成为“空巢青年”精神放松、职场求存和自我规划的生活空间，从而应对市场经济中事业奋斗的忙碌、契约关系的理性与职场文化的规训。

四、结论：中国式现代化个体化崛起的本土路径

纵观全文分析，本文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研究语境下关于“空巢青年”类型的静态划分，呈现了当下“空巢青年”复杂、多变且弹性的生存样态，不仅增加了人们对转型期中国“空巢”命题的认知，同时也拓宽了个体化时代中国家庭亲密关系变迁的多元想象。那么，究竟如何理解“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生存样态和情感调适？这种多元流变又将如何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行动与结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博弈和协商？事实上，本文语境下“空巢青年”生存样态的流变性，早已超越了上述三种理论争议。就此而言，迫切需要从个体私人生活的日常实践入手，探寻隐藏在个体多样生活面貌背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也是理解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中国家庭现代性变迁本土路径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近来有学者指出，流变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庭变迁及家庭问题呈现的重要特征，并认为“流动性”的框架对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②透过“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生存样态和情感调适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家庭流变改变了传统社会同居共财的家族结构，形成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家庭生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在自我世界、家庭关系和社群交往中形成了一种“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的亲密无间，迎合了个体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婚姻家庭观念变革、全球化风险和福利制度不完善等，此时流变性也成为个体生活的行动策略，从而应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各类不确定风险。“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弹性交往作为一种行动策略，也让单身、独居且漂泊异乡的青年有效地应对了职场压力、关系疏离、道德滑坡、理性算计等结构约束，实现了个体自由和精神归属的平衡。但是这种弹性流变作为一种策略，本身也暗含着“空巢青年”的情感迷失、无奈和焦灼。

由此发现，亲密无间的情感调适不仅展现了转型期“空巢青年”生存样态的多元流变特征，也彰显了个体和社会两种力量的博弈和交织。一是来自个体化崛起的自我决策，另一是来自诸如福利制度、市场竞争等社会力量的形塑。而本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形成过程显然更多是受到社会力量的形塑，在一定意义上是现有结构安排下青年人为了争取私人空间和情感诉求所做的协商和努力，更是社会力量形塑下青年人自我探索和妥协的结果。这也就说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呈现了结构安排之下个体理性的生活探索，这种生活探索源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下的私人生活转型，却

① 张奇勇：《社会上、下位心理的情境泛化及对情绪感染的调节》，《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吴小英：《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又受制于社会变迁的结构约束。这既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崛起的特殊之处。

总而言之，“空巢青年”亲密有间的情感调适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固有框架和观念，形成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弹性交往。这不仅为中国婚姻家庭的变革带来新的可能，也让人们对中国家庭的现代性变迁充满想象力。伴随后现代主义和后家庭时代的临近，单身、同居等非传统婚姻家庭模式日益在中国社会出现。因此，要正视且包容当下中国婚姻家庭发展转变的多元性和流变性。在复兴中国家庭传统文化要义的同时，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入手来帮助青年在城市安家立业，让家庭主义与时俱进，激发青年积极的婚恋观念，实现个人和家庭和谐共生。这既是当下中国婚姻家庭焦虑的破解之道，也是适应中国婚姻家庭领域不断变化的有效途径。

Intimate with Distance: The Life Practice and Social Shaping of “Empty-nest Youth” in the Era of Individualization

YU Zhi-q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In the rising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empty-nest youth” has become a hot social phenomenon with increasing media and publ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iversity and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practice of empty-nest youth from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ise of individualization led to the “empty-nest youth” from a self-perspective, showing an intimate but distance way of lif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satisfaction of personal needs based on the design of life, it also maintai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Being intimate but with distance is also a microcosm of the empty-nest youth’s life strategy. It shows how social forces shape the empty-nest youth’s self-exploration and compromise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it also implies a dynamic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system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is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rise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right under the second modernity in the west, but also reveal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brings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change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China.

Keywords: Empty-nest Youth, Emotion, Intimate with Distance, Individualization

[责任编辑：廖 霞]